

犀比·鲜卑·西伯利亚

——从《楚辞·大招》描写的带钩谈到古代文化交流

萧兵

(一) “坐客满堂，视钩各异”

《楚辞·大招》在极力铺写“六博”赌戏热烈紧张之时，为什么突然插进这么一句，“晋制犀比，费白日些”。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汉〕王逸《章句》（简称王注）说：“言晋国工作簿棋箸，比集犀角以为雕饰，投之皜然如日光也”。这个显然是望文生义的解释甚至控制和影响了现代的一些注解：“晋国所制作之博箸之器，以犀比刻之，皜然有光如白日也”①。“犀比，可能是犀角制成的另一种赌具。这两句是说，除了六簿而外，还有这种玩意，大家玩起来，费了整天的时光”②。

其实“犀比”根本不是赌具，和犀角也没有什么必然关系；费也不是浪费，而是光照的意思。清代某些学者已发现了王注的错误。〔清〕阮元曾指出犀比是带钩之名：

“犀毗、鲜卑、犀比声相近而文互异，其实一也……王逸以为博棋，误矣”③。〔清〕孙诒让《札迻》（卷12）说犀比指带钩，原出于赵，故云晋制，以黄金铸造，所以光耀白日。〔清〕吴汝纶《楚辞注疏》则说：“益犀毗为瑞兽，此殆刻作玩好之具耳”（吴似未明确其为带钩）。其实〔汉〕班固《与窦将军笺》已经明说犀比是“金头带”〔钩]：

“复赐固犀比金头带，曰此将军所自带也”。《史记·匈奴列传》作胥毗，集解引徐广曰“或作犀毗”，索隐引张晏云《汉书》作“犀毗”，此并“犀比”之变。但是狂赌之时为什么提到带钩呢？王注等说是赌具，当然不对。有人则很巧妙地把它说成是赌注：

“泉棋得胜有报酬，荒费白日，赢得金带钩”④。（案：《庄子·达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殚”。成玄英疏：“以钩带赌者，其物稍贵，恐不中的，敌心怖惧而不著也。”）看来用带钩来作赌具并非毫无可能。但是这是否符合《大招》

御使大夫、岭南节度使，“先是帅南海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戮不受托，禁绝卖女口”（《旧唐书·列传第一〇四·孔戮》）。

“倘遗”是赠送，即买奴婢作为礼物送人。唐宪宗的禁令，当然是一纸空文。孔戮特别禁止买卖“女口”，可见妇女买卖最多。唐代婢、妓、妾都属奴隶性质，不容混淆。杜佑“在南海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旧唐书·列传第九七·杜佑》）。杜佑是唐中叶有名宰相，旧史说他一切都好，就是上述这一件事，受人反对。这无疑是孔丘“正名”，“勿以妾为妻”的维护奴隶制的反动说教作祟的结果。

的实际情况，还要求进一步的证据。有人则指出：“赋方言博，而及此者，以夸分曹并进者容饰之盛也”^⑤。这比较合理。这班宫廷狎客在豪赌之时，酒酣耳热，揜拳搦袖，“成桌而牟，呼五白些”，大呼小叫，举足露襟，那光可照日的带钩也就在“兰膏明烛”之下闪闪发光了。但这说的还不透彻。这里跟《招魂》其他地方一样都是着力夸耀豪富、奢侈。男人的服饰一般变化不大，值得炫耀的只有光华夺目的带钩之类。这有点像西方社交界的绅士喜欢炫耀钻戒、袖扣、别针。《淮南子·说林训》说：“坐满堂（一作“满堂之座”），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因为带钩精巧华美，价值较高，所以常常被偷，“窃钩者诛”的成语就从此来。只要看看古今传世、出土、采集的战国两汉无虑千百件带钩，争奇斗妍，巧夺天工，有如群星璀璨、百花争艳，就明白《招魂》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带钩了。

（二）犀比、鲜卑郭洛带和瑞兽

《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这一回王注却比较正确：“鲜卑，衺（缙）带头也。言好女之状，腰肢细少，颈锐秀长，靖然而特异，若以鲜卑之带而束之也。”

《大招》多写少数民族奇俗异饰，例如“靺鞨奇（畸）牙，宜（龇）笑畸只”写“拔牙”之俗，“曾（层）颊奇（削）耳，曲眉规只”传割面离耳之风^⑥，反映了当时民俗和审美趣味之古朴、奇特而又多样，也反映了当时中华各族文化艺术融汇、交流的情况。《荀子·君道篇》说：“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战国策》作楚灵王）语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晚周凤夔人物帛画》也显示了女娲腰肢之细^⑦。这些都可以与《大招》盛赞“鲜卑”容饰之美相参照。（《大招》此句或谓“小腰秀颈”者如鲜卑之好女，但鲜卑之“小腰”本与束带著钩有关；近日或有说此以带钩之纤细以状美女之小腰秀颈，说新而巧，惟较牵强。）

《大招》之“鲜卑”音近《招魂》之“犀比”，也就是《史记》、《汉书》里的“犀毗”、“胥毗”、“师比”。带钩之称“鲜卑”，有如《汉书·匈奴传》颜注所说：“〔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称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张晏注称：“鲜卑郭洛带，瑞兽也。东胡好服之。”《东观汉记》也说：“郑遵破匈奴，上赐金刚鲜卑缙带一。”现将这类带钩的异名表解如下：

鲜卑式带钩异名表

名称	出处	附注
犀比	《楚辞·大招》〔汉〕班固《与窦将军笺》	
犀毗	《史记·匈奴传》一作《汉书·匈奴传》	《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或作犀毗”。
胥毗	《史记·匈奴传》	
师比	《战国策·赵策》	参见《汉书·匈奴传》颜注
鲜卑	《楚辞·大招》《东观汉记》	参见《汉书·匈奴传》颜注及所引张晏说
私毗	《淮南子·主术训》〔汉〕高诱注	

这证明犀比、鲜卑都指鲜卑式带钩，产品以产地名。但带钩为什么称做“犀比”，鲜卑的语源又是什么呢？王注硬要把它扯到犀牛上去，说是“比集犀角以为雕饰”（近代注释如上引《楚辞选》注亦沿袭其误，以其为犀角所制之赌具）。又有人以为犀比指犀牛角，犀牛是鲜卑瑞兽或图腾：“犀角，可以解毒辟邪；那末，带钩之称‘犀比’，古代的带钩，显然以犀角为质，所以辟除不祥的。近世学者总说，犀比是鲜卑的对音，我认为鲜卑正是犀比的音转，盖其民族以犀牛为图腾，犀牛自古即视为瑞兽”^⑧。如果认为“犀比”之“犀”因借音而与犀牛之“犀”偶同，就说犀比式带钩为犀角所制（这在考古上也毫无证明），那么，“师比”也可以解释为用狮子肚脐眼装饰带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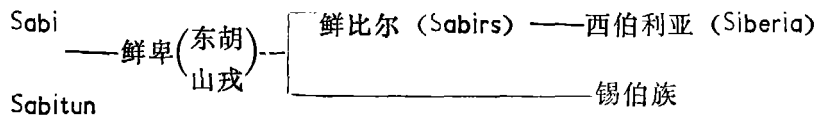
“鲜卑”是我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名称，或号“山戎”（鲜、山古音通），属于所谓“东胡”系统，而与东方夷人集群有密切关系。其语源，或说与saī—bi对音，即满族语的sa—bi，义为“祥瑞”“神奇”^⑨。《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张晏曰：“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东胡好服之。”郭洛，通古斯语对音为kwuk—lak，义为兽，“鲜卑郭洛带”就是“瑞兽之带”^⑩。这种瑞兽或即鲜卑或东胡之图腾。有人说：“《魏书·帝纪·序纪》谓献帝邻命诘芬南徙，‘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失行引导，历年乃出。’此神兽似即鲜卑。东胡人以此兽状铸镂带钩之上”^⑪。有人则认为“鲜卑”（犀比）跟满族语言里的神兽Sabitun（麒）Sabin—tu（麟）有关系；“带钩”（vtok）则与下列语词有关：通古斯（Tunguse）语，“纽”或“扣纽”叫做topti、topvci，结纽叫做topte—lam；蒙古语，“扣纽”叫做topse、topče；又《元史集》有“金控钮”，意指Altān Topči，源于突厥（Turk）语top·top（原义为“球”，引申为集合、堆积）；又叶尼塞河流域的奥斯佳克（yenisei—Ostyak）语称“钩针”为dup、dupta，噶特（kott）语则称为tupun、tuPunse，并与带钩有关。结论为：“似属匈奴语之胥毗，其语源似与上述诸语相同”^⑫。但是“犀比”或“郭洛”并不就是带钩或钩钮，本身与topse等音读距离甚大，它们指带钩的产地和品种。“犀比”音近满语Sabitun，“郭洛”音近通古斯语Kwuk—lak，似无可疑，原义都是“神兽”，最初以之作为带钩型样和装饰母题（Motive）是很可能的（后来的带钩除部分为几何形外，绝大多数以动物形体造型，尚保持其图腾装饰之传统）^⑬。

（三）鲜卑、鲜比尔、西伯利亚

鲜卑是我国东北方一个历史古老的少数民族，战国时期属所谓“东胡”系统，与东夷集群关系也很大（“东胡”一词因其主要活动于匈奴之东而得，过去一些中西学者因语音偶同，直认为“通古斯”族，其实鲜卑、匈奴关系密切，主要操蒙古语，间有通古斯、突厥成分，并属蒙古人种^⑭，为我国境内之少数民族）。《国语·晋语》有一条极其重要的记载：“昔〔周〕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莛，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⑮。韦注：“置，立也。莛，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望表，谓望祭山川，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鲜卑，东夷国。燎，庭燎也。”它说明：第一，在传说里西周初期已有较强大的荆楚与鲜卑族一起活动（《逸周书》已有“山戎”和“东胡”）；第二，楚人的一支最初也可能活动于东方，被分配与鲜卑一起“守燎”，“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两者关系或已相当密切（《大招》提到鲜卑，决非偶然）；第三，鲜卑与楚并为周人属国，其一部当时或已进至周人势力之中心直至岐山一带，只是地位比其他诸侯略逊，此次“不与盟”而已；第四，楚立束茅，设木表（木表犹满族祭天之“杆子”，近于所谓toten Pole），与鲜卑一起担任烧庭燎之任务（以燎柴祭天，寓保存火种之遗意，后乃转为烽火），职司近似，或源流有自，或衍为风俗，而近于殷商和匈奴之旧习。两汉史料一般也都认为鲜卑属“东胡”，起于“鲜卑山”，活动于“饶乐水”（但是这两处的确切地理争论很大）^⑥。

下列的说法值得加以考虑：鲜卑最初活跃于我国辽河流域，逐渐向西北方向发展，其一部滞留我国东北，成为今天的锡伯族；另一部则通过蒙古草原深入到黑海东岸、西伯利亚南部，和那里的土著友好相处，后来成为鲜比尔族（Sabirs），并且用瑞兽“鲜卑”之族名命名那个地区，这就是“西伯利亚”（Siberia）一词的由来^⑦。其关系可示意如下：



（四）犀比与战国带钩

我国中原地区人民自古以来就有超卓的胆识，坦荡的胸怀，恢廓的风度，敢于也善于向兄弟民族和外国学习先进而优良并适合于我的科学文化艺术。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在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基础上吸取兄弟族文化的杰出事例^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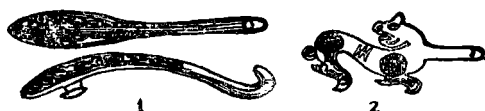
早在赵武灵王之前的春秋，中原或已使用带钩。管仲射齐桓公中钩的故事是很有名的^⑨。王国维《胡服考》援用这个故事以及《荀子·礼论篇》“缙绅而无钩带”之文，说：“绅为大带，则钩带或指革带，皆古带用钩之证”^⑩。战国前期肯定已用带钩。金文“句”作𠄎（《姑馮句𠄎》）𠄎𠄎（《其𠄎句𠄎》）。郭沫若同志认为，此字即“钩带之象形也”^⑪。一事物反映并凝固于文字形体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河南信阳长台关和湖北江陵望山战国墓都出土有金银错镂或错金嵌玉的带钩，其精美程度决非朝夕所可臻就。前者一号墓出土遣策云：“……一组带，一革，皆有钩。”“一素革带，有𠄎钩，黄金与白金之𠄎”^⑫。后者二号墓出土遣策也说：“……一革带……一玉钩，一环”^⑬。其时代都属战国前期，江陵二号墓稍晚，但都早于《楚辞》时代，可以作为《大招》艳称“犀比”的佳证。王国维说：“《大招》或云屈原所作，或云景差。二说不同，要在楚顷襄王放原江南以后，去赵武灵王之初胡服，至少且十余年。故有鲜卑之语”^⑭。十余年弹指之间，如果楚晋在赵武灵王之后才有带钩，根本就不可能把土产的“洋货”夸耀得这样眼花缭乱、光照白日，这还不说从北方到南方所需要的传播时间。《赵策》说武灵王以“黄金师比”赏赐大臣，其为“土产”的可能要大一些。《齐策》说田单“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澠之间”，也可见当时骑术之精、胡服之盛、带钩之美。

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写过《带钩之研究》一书^②，著录了几百件各家珍藏披露的带钩，可惜几乎全是收购采集的传世品，无一直接科学发掘者，无法断定哪些是战国出品。但是解放后我国出土了大量战国带钩，可资比较研究。限于题目和篇幅，这里只能举几个与《楚辞》有关者。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出土了铜带钩十四件、铁带钩四件，有的贴金，有的镶嵌绿松石，特别是其中I式琵琶形带钩，面饰错金云纹与蛇头图案，嵌绿松石，VII式虎形钩，腰间铭有“王”字，并饰花斑纹（图一），精美绝伦^③，可为“晋制犀比，费白日些”之实证。山西侯马战国中晚期奴隶殉葬墓出土错金银的铜、铁带钩，甚至被害的奴隶身下也发现一个简陋的铁带钩（图二），可见晋地服用“犀比”之普遍^④。楚墓出土带钩也相当繁富精美（图三）^⑤。

关于带钩的使用方法，传为洛阳金村战国出土的立式铜人，腰束有钩革带（图四），十分珍异，可供参照^⑥。正是因为带钩的广泛使用和工艺的精进，从战国到秦汉发生过许多关于带钩的传说。上引“管仲射钩”就是一个例子。《帝王世纪》和《论衡·恢国篇》还记载着商汤得天下“白狼衔钩”来献的故事，只知道这“钩”指什么钩。

战国后期，南方金属铸造雕镂工艺有后来居上之势。战国晋、赵、楚自铸的“犀比”已值炫耀或赠遗，汉初的“胥纟”还能用以赏赐匈奴，这不仅含“宝剑送英雄，红粉赠佳人”之意，而且证明其工艺已远胜于原产地，不然决不敢“鲁班门前卖大斧”。



图一 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带钩
1. I式(25:108) 2. VII式(49:6)



图二 山西侯马奴隶殉葬墓出土铁带钩



长沙东北郊战国墓出土蛇头饰铜带钩



湖北宜昌前坪战国墓出土铜带钩



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出土铜带钩

图三 楚地战国墓出土带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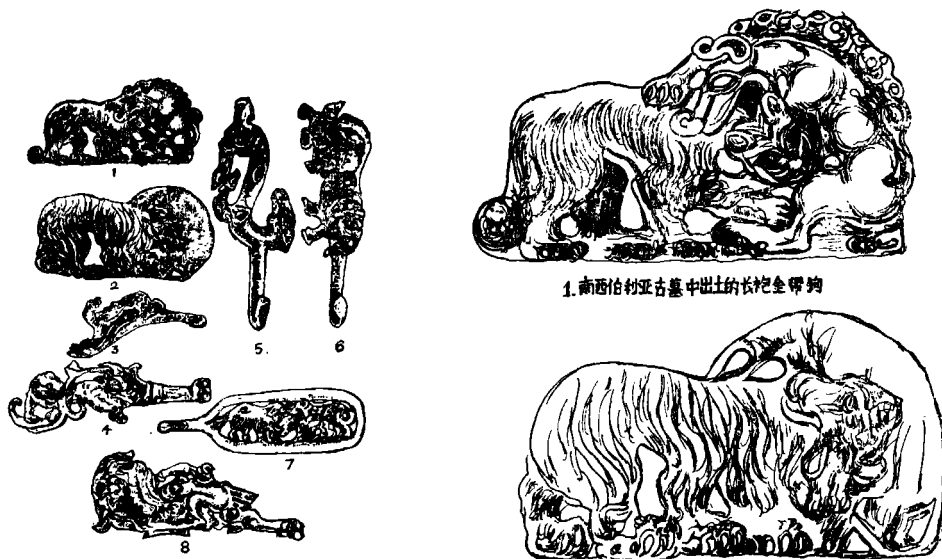
(細部)
革带与带钩之供用
图四 洛阳金村出土青铜人象
(战国后期
通高25.5厘米)

(五) 犀比和斯基泰艺术

在公元前 8——4 世纪活跃于黑海北岸以至西伯利亚草原的斯基泰人 (Scythian, 我国史称“塞种”) 是“胡服骑射”的草原文化游牧民族，使用带钩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说他们“所有装饰在头部、腰带、胸甲上面的东西则都是黄金制作的”^⑦)。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和鲜卑、匈奴等很可能向他们学习到一些铸造、雕饰动物文样的青铜器物 (包括带钩) 的工艺技巧。有一件传世的斯基泰带钩和我国内蒙地区出土的一件“猛虎衔

兽”带钩就十分相似(图五)，所示大都是接受斯基泰艺术影响的以“兽斗”为母题的带钩)⑩。但是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有生命文化一般都是土生土长、根深叶茂而富于特色的。匈奴式、鲜卑式乃至战国式带钩的形制可能来自异域，文样装饰也接受了一定外来影响，但是其母题和基本构思却主要是独立的，自成体系和别具传统的。长广敏雄《带钩的研究》就相当细致地分析了各种各样传世带钩的文饰(尤其是其中动物文样)的中国特色和渊源。目前出土的许多战国式带钩如果摆在一起，简直就无法区别它是匈奴式或鲜卑式的，是晋制的还是楚出的。这就说明它们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统一而又丰富的文化里而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了。中华民族对外来的先进文化决不是心怀恐惧、顽固拒绝或奴性模仿、机械照搬，任何独立强大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也都不会孤芳自赏、妄自尊大。鲁迅在《愤·看镜有感》里说健康而强盛的汉代从来就不讳言“洋”——“海马葡萄”就是“洋”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大量而积极地吸收外族、外国文化对于中原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科学进步、艺术繁荣，是有刺激和推动作用的。

任何健康的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斯基泰文化以及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给予我国春秋战国秦汉艺术一些有益的启发，它们也可能接受过我国殷商青铜文化的有力启示。斯基泰文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石头里蹦出来的。它同样也接受外来影响。斯基泰艺术最具特色的一些母题，例如猛兽相搏、猛犬猎兽、Griffin狮鹰兽噬畜等等，以及“后部扭曲”、“四肢蜷缩”、“枝角缠绕”等等表现手法，就鲜明地表现了古代巴比伦——亚述文化、古代伊兰文化、古代希腊文化的影响。我国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的关系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如果有人抓住某些毫不足奇的交流文化的事实，又因为斯基泰人在他们现在的国土上活动过，就夜郎自大似地大吹大擂起来，以为“我们从前比你们阔多了”，那实在是比阿Q还可笑；而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及一点、不计其余，就胡说什么中国文化是



图五 兽斗母题之带钩 1.南西伯利亚古墓出土之长袍金带钩 2~8.中国内蒙古等地出土带钩

2. 中国青铜带钩 图五 斯基泰式带钩和中国内蒙地区出土的带钩

“外来信息”的产物，为早已破产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招魂续魄，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那就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中华民族从来独立自主，而又谦虚、坦荡。我们祖先主干之一的楚国人就公然称带钩为“犀比”，不因其有个译名就视作异端、予以排斥，更不因其为“晋制”就斥为外来、拒绝接受。《楚辞》里提到不少“进口货”，却大都抱着一种光明磊落和大无畏的态度，仅就这一点说，《楚辞》也可以光照白日。

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考古学、历史学、文艺学界，好些年都不愿意接触古代史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不喜欢谈论我国人民敢于向外国学习的事实；对于有关我国古代史上与奇姆迈里文化、斯基泰文化、塞伊姆文化、卡拉索克文化等等的关系问题，尤其不愿多所涉足，以致成为考古学上不得挖掘的禁地、历史学里不能窥探的禁区。甚至连我国人民首先给予启示、后来我国的艺术才接受了它的某些“文化因子”的“反影响”的光荣事实，也往往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以“晋制犀比”“若鲜卑只”的考释来说，本来可以追本溯源，求出我国商代文化首先通过北狄文化（包括蒙古草原文化）以及卡拉索克(Kara suk)文化的折光投射给斯基泰·西伯利亚(Scythian—Siberia)文化以某种光辉的史实；也可以证出“西伯利亚(Siberia)这个词来源于我国东北的“鲜卑”(Sabi)的语言演化迹象。但是许久都无人接触。我国的商周文化、北狄文化曾经给西伯利亚地区的土著文化以积极影响，我国北方、东北乃至中原的居民或者说移民，曾经跟敏奴辛斯克(Minusinsk)等地土著友好相处，同时接受古代东西方文化的启示，创造出光辉灿烂、富有特色的卡拉索克青铜文化，并把其光荣传统和某些因素溶汇为别具一格的“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建树过不朽的功勋^⑥。这种历史的殊荣甚至被当成病变而被掩饰了。至于我国从北方到南方的人民有胆量、有能力、有气度，能够创造性地学习、仿制外族或外国的文化珍品，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有所改进、有所提高；战国时期晋国制造的“斯基泰·西伯利亚”式“犀比”，已值得文化先进的楚人加以赞美和夸耀。然而在林彪、四人帮、康生“洋奴哲学”、“投降主义”、“崇洋媚外”、“西方中心”等等大帽子的威胁下，有人却把它当作“家丑”而不得外扬。真是可笑可悲之至。我们的某些研究论著不谈犀比、鲜卑的语源和对音，不谈战国式带钩的原型、流变和发展，更不谈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包括某些因子的播化)。这种情况难道还要永远继续下去吗？

注：

①文怀沙：《屈原招魂注译》，《文史》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第72页。

②马茂元：《楚辞选·招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04页。

③〔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汉丙千神钩》10·9。原误《招魂》为《天问》。

④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54页。

⑤朱季海：《楚辞解故拾遗·招魂》，《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1963年，第137页。

⑥参见拙作《楚辞·大招新解：屠酺奇(畸)牙》及《曾(层)颊奇(削)耳》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⑦参见拙作《夔魅·祖明·女娲——晚周夔夔人物帛画新解》。

⑧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店，1961年，第176页

⑨⑩参见〔日〕藤田丰八：《犀毗和廓落带问题》，《剑峰遗草》，第51—64页。

〔日〕江上波夫：《关于师比和廓落

带》，《东方学报》第2期，东京，1931年；《经路刀与师比》，原书未见。又参见注⑩。

⑪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73页。

⑫⑬参见〔日〕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原载巴黎《亚洲杂志》200卷，1923年；后改题《蒙古民族起源考》，载日本《史学杂志》第18卷，第2—5期。此据何健民译文。

⑭kwuk—luk不知何兽。与鲜卑——匈奴式带钩关系极密切之斯基泰艺术中常见名为 Griffin之狮鹰合体兽扑食偶蹄类动物之母题，其形象亦偶见于带钩。Gri——发声近于“郭洛”，我国鄂伦春族犹呼鹰为“阔里”，其间对音关系颇值注意。

⑮《国语·晋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下册，第466页。《四部丛刊》影明刻宋“公序”本“鲜卑”作“鲜牟”，或据以否认战国有关于“鲜卑”之记载（见注⑩）。其实《招魂》之犀比，《大招》之鲜卑，既指带钩，又标出产地，且明楚与鲜卑之特殊关系，毋庸置疑。

⑯《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云：“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又曰：“山戎，盖今鲜卑。”徐广云：“鲜卑，东胡别种。”引〔汉〕应奉《上桓帝书》：“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翰苑集》注引《汉名臣奏》：“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出塞。鲜，少也；卑，陋也。”（案：此二条无据）《后汉书·鲜卑传》：“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三国志·魏志·鲜卑传》：“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翰苑集》注引司马彪《后汉书》：“鲜卑，亦东胡之支也。”《北史·魏本纪》：“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三国志·魏志》注引〔晋〕王沈《魏书》：“鲜卑，亦东胡之余也。”《文选·西京赋》李注引《魏书》作：“鲜卑者，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关于鲜卑山及饶乐水之地理，有通古斯河南（丁谦）、喀尔喀（《朔方备乘》）、呼伦贝尔河草原（翦伯赞：《内蒙古古》）等说；安志敏先生以辽水即今辽河，鲜卑人活动范围在今西拉

木伦河，见《关于内蒙古札赉诺尔古墓群的族属问题》，《文物》1964年第5期，第45页。

⑰《朔方备乘》云：“东汉、魏、晋之鲜卑，其庭幕在喀尔喀，而封豨则远及北海。今俄罗斯东偏之锡伯利部地，咸为所兼并。”或据以补充道：“鲜卑音转为锡伯，今黑龙江南、吉林西北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名。”见章炳麟：《庵书·原人》，中华书局，1958年，第104页。

或云：“今外蒙古以北之地，西人皆称为悉比利亚（siberia），悉比即鲜卑转音，以其地皆鲜卑人种所分故地。”见丁谦：《后汉书·鲜卑传地理考释》。

或云：“盖自里海一带至西伯利亚及辽水流域等皆鲜卑族居处（西伯利亚之名即由鲜卑而得，西方之鲜卑尔，亦即鲜卑异译），故《后汉书》所云非是；盖鲜卑乃其大名，非种族以山名，实以种族名山也。”见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考》，开明书店，1948年，第114页。

某些西方作家把“西伯利亚”之得名推得更晚。例如〔美〕麦高文说，公元五世纪，“若干中亚人民为求避免柔然（阿哇尔）之控制，遂决定向西方迁移。其中最重要的一支，称为西伯人（sabirs），后世西伯利亚（siberia）一名，也许便是因他们而产生的。”见《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第199页。

⑱事见《史记·赵世家》《六国表》及《资治通鉴》有关章节。《淮南子·主术训》：“赵武灵王贝带、鸪鹑而朝。”高注：“鸪鹑读曰私毳头，二字三音也。曰郭洛带，系桃鞞也。”

⑲《左传》僖24年：“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杜注：“中带钩。”《国语·晋语》：“乾时之役，申孙之矢，集于桓钩。”韦注：“带钩也。”《史记·齐太公世家》：“管仲射中小白带钩。”《吕氏春秋·贵卒篇》：“管子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钩。”

⑳㉑王国维：《观堂集林·胡服考》，中华书局，1959年，第1073、1077页。

㉒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76页。

㉓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的报导。

（下转第60页）

其“良知”便是仁义礼智信。按照这个程序修身养性，直养得“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同上），然后方可治国平天下。这实质上是要求地主官僚都蒙上一层“仁义道德”的面纱，施展牧师的伎俩，掩盖其对人民的暴行。

总之，封建礼教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钳制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俯首听命地接受统治者和族长、家长的奴役、摆布，言行不敢越雷池半步，成为封建愚民政治的驯服工具。违反礼教，就会被认为大逆不道，不但要受到法律、族规、家法的制裁，而且还要遭受社会道德力量的打击。清代学者戴震深刻地指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揭露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在封建社会，多少敢于反抗封建秩序，有进取精神和追求自由的人，都死在这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下，无怪乎鲁迅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吃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只吃人的猛兽，却是锦衣文绣，冠冕堂皇，还带有弥勒佛式的笑面！

封建礼教对于人民群众的钳制和毒害，很大程度地起到了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它在整个封建社会没有遭受到一种新思潮或异端思想致命的打击，地位是相当牢固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西方的宗教神学。它束缚和熏陶人们的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对中华民族的毒害，可谓深矣。

综上所述，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古代奴隶制的若干特点，由此演变为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村社制和宗法制，及与之相适应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礼教。小生产的经济特点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严重的惰性，宗法制、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作用，加大了这一惰性，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长期得不到飞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迟迟不得产生，封建制度延缓了两千多年。建立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长期的存在，伴随着它的官僚政治只能日趋腐败，封建特权也与日俱增，宗法制在小农经济和封建村社的环境中，向着社会的最低层发展，变得根深蒂固；封建主义思想也由于长期统治着意识形态领域而深入人们的头脑，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总之，中国封建社会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与以它为基础的上层建筑相互作用，使中国封建制度成为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制度。社会基本上处在锁闭、保守、沉闷和僵化的状态中。这一切，使封建主义形成强大的传统力量，影响极其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受其害。

（上接第22页）

②⑤ 《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图二四。

②⑥ [日]长广敏雄：《带钩四研究》，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报告》第17册，1943年。

②⑦ 《山西长冶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3年第3期，第133页。

②⑧ 《侯马战国奴隶殉葬墓的发掘——奴隶制度的罪证》，《文物》1972年1期，第65页。

②⑨ 参见《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以及注②⑩。

②⑩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73页。

②⑪ 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二期图版四。又参见徐中舒：《徐氏编钟图释》。

②⑫ 参见拙作《斯基泰艺术断想》，淮阴师专编辑出版《活页文史丛刊》第60号，1980年。